从《商务叹》看郑观应对 官督商办的态度

徐元基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郑观应的《商务叹》一诗，在当今学术界可称得上是脍炙人口了。由于这首诗运用形象化语言，鲜明突出，又由于郑观应长期从事洋务企业活动，知之真切，所以，一般论者在述及晚清官督商办企业并进行批判时，很自然地引用这首诗。但是，几乎形成一种风习，部分同志往往摘取《商务叹》中“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两句，就给官督商办制度结案，却不去进一步探究这首诗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写的，它抨击的具体对象到底是谁。

我们查阅通行的宣统元年（1909年）刊印的《罗浮倚鹤山人诗草》（简称己酉本），郑观应用“虎”、“狼”一类词语表示极端憎恨的有十馀处，都系揭露和反对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如怒斥清廷媚外、丧失主权：“拒虎不得复进狼，狼狽为奸矜跋扈。主权反授虎狼操，羔食何时能饱肚！”（《保主权》）又如控诉1900年沙俄在我东北的暴行，“言甘似仁义，心狠若豺狼。……驱人下河海，视我如犬羊。”（《书东三省俄兵暴虐事》）用“虎”指责内政的仅两处：一处为《有友出山人官索赠言，书此贻之》，“数里设一卡，巡丁苛如虎，勒索多中饱，国课终无补。”另一处即《商务叹》。如果联系郑观应多处使用“虎”一类词语的含意，就不难看出郑观应以之加在官督商办的头上，反映他的愤慨之情确实到了非同寻常的程度^①。

---

① 用“虎”指责内政，盖源出于“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下》）。用来批判官督商办制度，则较早见于何启、胡礼垣在1898年春所写的《新政始基》。该文云：“今铁路之议，其名曰官督商办，是民之事而主之以官也。……中国之官素未得民，中国之民素畏官府。当此之时，纵使官极惠民，欲民视之如父，民犹疑其为虎；官极爱民，欲民视之如兄，民犹疑其为狼。而况乎未诚而欲令民信，未信而欲令民任也哉！”这里说“疑其为虎”，远不如郑观应“官督商办势如虎”那样痛切。

目前所能看到的《诗草》，有两个刊本和一个稿本。最早的是光绪戊戌年（1898年）五月上海雒鹤书屋刊本，一册不分卷（简称戊戌本），没有《商务叹》这首诗，亦无上引类似的句子。光绪甲辰年（1904年）冬，郑观应在粤亲笔修改《诗草》，有一部稿本，毛订两册，两卷（简称甲辰稿本）^①。这部诗稿对戊戌本作了修订，又增加了戊戌年以后的诗作。卷二有《商务叹》一诗，改动较多，墨痕纵横，勾乙难辨。甲辰稿本的《商务叹》与以后的己酉本那首，文句内容上有差异，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并无大家最感兴趣而常加引用的两句，“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至少，直到1904年冬，郑观应还没有想到使用如此尖锐的字句。这就需要我们作深入一步的考察。

郑观应对官督商办制度的认识和评述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基本上可分为两个阶段：1900年以前和这年以后，既有一贯性，又有明显的区别。

一

1900年以前，在当时特定的社会条件下，郑观应基本上是赞成官督商办的，并热情从事几个主要的官督商办企业的经营活动，担任要职，备受重用；他认为，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等几个大企业都办有成效，这跟李鸿章的督护和盛宣怀的作用是分不开的，郑观应本人同他们的关系十分亲密。与此同时，郑观应也指出官督商办制度存在的弊病，作了一定程度的批评。

首先，郑观应基本上赞成官督商办，长期而积极地参预官督商办企业的经营。从1878到1902年间，他先后担任上海机器织布局、轮船招商局、上海电报局、汉阳铁厂等重要官督商办企业的帮办、会办、总办等实职，达二十年之久。郑观应看到兴办新式企业能获大利，且可挽回被外人夺去的利权，杜塞漏卮，实为国家富强的根本要务，但关键在于官府是否保护扶持。他对李鸿章主持创设并多方护持官督商办企业是信任的，因此，愿意为这些企业效力，施展才能。他在当太古轮船公司买办时，已兼任官督商办企业的职务。1878年，前四川候补道彭汝琮发起在上海设立机器织布局，禀请李鸿章札委郑观应会办。郑观应觉得同彭相知甚浅，获悉这个消息后“实深骇异”^②。由于他认识到“洋布入口日多，亟应仿照西法，用机器纺织，以塞漏卮。官应昔闻绪论，甚愿究心”^③；加上李鸿章的批示，使郑观应“过蒙奖许，又谕彭道以遇事会商，

① 这部诗稿现藏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② 《致彭器之观察书》，《盛世危言后编》，卷七，第13页。以下简称《后编》。承夏东元同志借阅该书的缩微胶卷。此信转载《洋务运动》第7册，第488页。

③ 《上驻英公使郭筠仙侍郎书》，《后编》卷七，第10页。

并许联衔具禀”，而感到“遭逢恩徕，优异逾恒，苟可稍答涓埃，曷敢自甘暴弃”^①，经过再三苦言力辞，还是接受了札委。尽管郑观应早就察觉彭汝琮办事虚诞，诸多不合，仍然尽力维持，垫付款项一万余两，直至一年后见局事迄无把握，才不得不将实在情形向李鸿章申报，坚决辞职。1880年，编修戴恒接办。李鸿章又札委郑观应与他所推荐的经元善驻局经理，随后再札委郑总办局务。郑观应表示，“同事诸君以官应稍习详情，禀明伯相，责令一手经理，顾念才力，深惧弗胜。惟蓄愿已久，今且复为冯妇，若不乘此鼓舞，力底于成，不特上负宪委，下惭良友，且重为远人轻笑，心实耻之。”^②1881年初夏，正当津沪电报线动工之际，郑观应欣然接受李鸿章札委总办上海电报分局。他说：“窃思电报利国利民，为当今急务。自顾菲材，既承不弃，何敢自外裁成。惟事属公益，经费尤宜撙节，所有收发材料一切事宜，津沪电线未成以前，无庸开支薪水。因弟在太古总理船务兼管栈房出入货物，司事颇多，可以兼顾。”^③李鸿章于请设津沪电线的奏片中提出，经费先从军饷内垫付，办成后招股集资，即由官督商办。1881年12月津沪电线竣工，翌年4月电报局正式由官办改为官督商办。郑观应满怀信心地写道：“愚见中国电报乃独市生意，招股不难……。虽目下所收电费入不敷出，将来风气日开，线路日多，获利必厚。查外国电线、铁路均属如是。”^④

郑观应在轮船招商局的时间最长，关系也最密切。他对正式脱离太古、进招商局，想得很多，“心若辕驴，殊难臆决”^⑤。但他终于毅然打消顾虑，辞去待遇优厚的太古职务，说明官督商办的招商局对他具有多大的吸引力。郑观应高度评价招商局，一则说“中国特设轮船招商局，夺洋人之所恃，收中国之利权，洵为良策”^⑥；再则说“轮船招商一局，实为中国振兴商务之权舆”^⑦。因此，他殚精竭虑，尽心协力，为招商局除弊兴利、扩展业务而不辞辛劳地远赴南洋一带考察，又到长江沿海各埠稽查，报告情况，条陈献策，连篇累牍。

中日甲午战争前，开平、漠河诸矿已见成效，朝野上下风气渐开，可是各地矿局大都存在不少问题。怎样才能办好近代矿业呢？郑观应总结了六条，其中第三条就是官督商办：“全恃官力，则巨费难筹；兼集商资，则众擎易举。然全归商办，则土棍或

① 《禀辞北洋通商大臣李傅相札委会办上海机器织布局事宜》，《后编》卷七，转载《洋务运动》第7册，第477页。

② 《上驻英公使郭筠仙侍郎书》，《后编》卷七，第10页。

③ 《复郑玉轩、盛杏荪、刘芑林、唐景星、朱静山诸君书》，《后编》卷十二，第1页。

④ 《致总办津沪电线盛观察论招商办电报书》，《后编》卷十二，第4页。

⑤ 《复津海关道郑玉轩观察书》，《后编》卷十，第1页。转载《洋务运动》第6册，第110页。

⑥ 《易言·论船政》，《郑观应集》上册，第92页。

⑦ 《盛世危言·商务》，《郑观应集》上册，第617页。

至阻挠，兼倚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办，各有责成：商招股以兴工，不得有心隐漏；官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分外诛求；则上下相维，二弊俱去。”^① 这里既专指矿业，又带有普遍性，表明了这时期郑观应对官督商办制度的总的认识。

1897年7月郑观应交卸汉阳铁厂总办职务后，曾作《铁厂歌》一首，开头详述铁厂官办阶段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困境：“斯时英雄气忽短，仰屋无聊但扼腕”；紧接着笔锋一转：“奇谋猛得变通法，改官为商机可转”。同官办相比，郑观应赞成官督商办，认为官督商办可以使企业改变面貌。他还提出，如果煤焦供应问题得到解决；移汉阳化铁炉于大冶，添造几座；选聘上等工程师制炼出好钢材，精益求精，那末，“虽不及德之克虏伯、英之奄士当郎规模之大，可供亚洲各国之用，然必获利无穷。再设工艺学堂以教授华人，何虑中国不能富强，终为外人挟制攘夺乎！”^② 郑观应对官督商办的汉阳铁厂寄予希望。不过，他在这里是撇开资金问题立论的，实际情况要比他想象的复杂得多。

其次，郑观应认为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等几个大企业都办有成效。就招商局来说，“每岁约可得回水脚银二百万两……我局督、会办及各董事均系熟手，立法亦极周密，与怡和、太古两公司已成鼎足之势。”^③ “由光绪十八年起至二十八年，此十年中获利最多。一股变两股，每股估银一百四十两（票面为一百两——引者）。”^④ 招商局股本原为200万两。1897年公议从公积项和自保船险公积项下，各提出100万两，转入股本，填发股票，合共股本400万两，所以一股变两股。招商局的资产总额也在急剧增加，1899年底达802万余两，1900年底已有958万余两之多。^⑤ 郑观应认为这些成效跟李鸿章的督护和盛宣怀的作用是分不开的。他对李鸿章推崇备至，说招商局仰赖李鸿章“主持督护，渐有起色”^⑥，“今有南、北洋之督护，海运米之专利，谓上台措置不周、体恤不至，可乎？”^⑦ 郑观应本人也对李鸿章感激涕零，一则“身受中堂栽培，感激不胜，其报效之忱时刻在抱”^⑧；再则“感荷恩遇逾格”^⑨；甚至在甲午战败后，赋七言排律四十二韵献给李鸿章，“不才有幸蒙培植，传谕频频起滞论。……廿年深感

① 《盛世危言·开矿》，《郑观应集》上册，第704页。

② 《论丙申年汉阳铁厂归商办情形》，《郑观应集》上册，第709页。

③ 《海行日记序》，《后编》卷十五，第9页。

④ 《辛酉年春致轮船招商局董事会书》，《后编》卷十，第128页。

⑤ 《清查整理招商局委员会报告书》，下册，第48-51页。

⑥ 《禀北洋通商大臣李傅相再辞轮船招商局总办事》，《后编》卷十，第12页。

⑦ 《致津海关道郑玉轩观察书》，《后编》卷十，第3页。

⑧ 《禀谢北洋通商大臣李傅相札委总办开平煤矿粤局》，《后编》卷十一，第1页。

⑨ 《禀北洋通商大臣李傅相为招商局与怡和、太古订立合同》，《后编》卷十，第10页。

受恩身。”“志在四方慙定远，书曾十上笑苏秦”^①，怀念当年十次上书、希望李鸿章采纳其济世良策的情景。郑观应对盛宣怀这个督办大员的作用也是肯定的。他回溯两次进招商局的十馀年中，进行整顿，添购轮船，建置码头栈房，获利甚巨，既有各同事们的“和衷共济”，更“幸藉我官保督办有方”^②。还论定盛宣怀“创办轮船、电报、织布、缫丝等局，通商银行，承办汉阳铁厂，勉为其难，厥功甚伟”^③。盛宣怀也予郑观应以高度评价，称他在招商局“设法整顿，劳怨不辞，颇著成效……为商局必不可少之员”^④。郑观应第二次进招商局时，“中外忌者，群起谣诼，极力排挤，谓官应如再入招商局，各司事当即告退，三公司之和约亦必不成等危词，以耸听闻”，幸亏盛宣怀“识力坚定，不为诡计摇夺，彼亦无可如何”^⑤。郑观应两次离开招商局后，“凡局中紧要公事，盛督办虚心下问，仍时驰书嘱与股东筹议，重则嘱朱君筱庄前来面商”^⑥。盛宣怀说，自己从事轮、电、路、矿垂数十年，与郑观应“共事最久，相知亦最深”^⑦。郑观应则极力恭维盛宣怀“匡济宏敷举世推”，表示“鸚荐不忘知己感”^⑧。

另一方面，郑观应对官督商办制度的弊病也作了一定程度的批评。姑举一例。1893年4月，郑观应稽查招商局长江各分局，抵达汉口的第二天，写信给盛宣怀说：“有股东云，我局公积之款甚巨，应如太古公司岁添二千数百吨之船，不应移款兼营别业等语。官应亦曾早与我督办谈及，承示本局宗旨宜用敛字诀，拟开银行为我局将来转输地步。虽是挽回利权之策，然擅拨局款兼办银行，不会商股东，祇求直督批准，于商律不合。盖商律凡公司欲营业，必须开股东会，从多数取决，才可施行。若使大权操自直督，无庸商诸股东，日后直督换人，所委总办假公济私者，流害不堪设想。故何沃生律师著书详论官督商办之公司私弊极多。因承未爰，不得不直言，尚祈我督办细思之。”^⑨郑观应在信中首先从原则上严肃指责官督商办制度的流弊。他曾专门请人翻译《欧洲各国水陆商政比例通议》、《香港商贾公司条例》等书，送给盛宣怀，

-
- ① 《上合肥傅相七排四十二韵》，《罗浮倚鹤山人诗草》戊戌本，第58—60页。甲辰稿本略作文句修饰。己酉本将此诗删去。
- ② 《致督办招商局盛杏荪官保书》，《后编》卷十，第67页。
- ③ 《致潘兰史徵君书》，《后编》卷四，第29页。
- ④ 《稟西湖督宪张香帅为汉阳铁厂事》，《后编》卷十三，第1页。
- ⑤ 《致招商局盛督办书》，《后编》卷十，第33页。
- ⑥ 《辛酉年春致轮船招商局董事会书》，《后编》卷十，第130—131页。
- ⑦ 《罗浮倚鹤山人诗草》盛宣怀序，己酉本卷一，第2页。
- ⑧ 《赠盛杏荪太常》，《诗草》己酉本卷一，第28页。
- ⑨ 《致招商局盛督办书》，《后编》卷十，第29页。

请他付梓后向清廷奏议，并提出“今欲整顿商务，必须仿照西例，速定商律”^①。其目的是要从法律上扫除多年来大小企业（包括官督商办及完全商办企业）所存在的各种积弊，“庶儿上下交警，官吏不敢剥削，商伙不敢舞弊”。郑观应还在不显眼的旁注中点到，“惟东、西国例，公司虽官助厚资而成，亦无官督商办之例”^②，措词婉转，而其微言大义则倾向于完全商办公司。其次，信中所说“大权操自直督”，实际上矛头所指也包括督办盛宣怀。郑观应于别处表明问题就在盛宣怀的身上：“第二十年前，即请添造大轮，仿日本求政府补助之法，以航行欧美。无如其时权操督办，议屡进而未纳。”^③这是因为“位尊而权重，得以专擅其事；位卑而权轻者，相率而听命。”^④后来他虽也公开批评盛宣怀未曾会商股东，而把大量资本转入通商银行、汉阳铁厂等，不合商律（尽管当时清廷尚未公布商律），却又轻描淡写地解释为：“此其好博不专、为名所累欤！”^⑤，替盛宣怀开脱。事实上，郑观应是极力支持盛宣怀创办银行的。他对盛说，“银行为百业总枢……拟邀京都一满一旗殷富者为董事，以期满旗中富宦存款不必存诸西人银行，则我开之银行自然丰足。岂独银行与铁路、铁厂相表里，亦属利藪。迟为捷足先登，诚为可惜。故电请勿中止，不可不开也”。^⑥既然银行、铁厂办起来了，亟需资本，而从拥有较厚资本的招商局抽去一部分，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所以，归根结蒂，郑观应赞成盛宣怀的决策，只是批评他没有跟股东商量，不符合公司手续而已。两人之间对办洋务企业有分歧的一面（郑观应倾向于办成完全商办公司，盛宣怀则不尽然），然而统一的方面还是主要的。

二

第二阶段，1900年以后，开平、电报、招商三局发生重大变更，郑观应也蒙受打击，于是先后指责“官夺商权”、“官督商办势如虎”，表示了极度的愤慨。郑观应在第二阶段对官督商办制度的态度和评述，比第一阶段有着明显的区别。

这个阶段较集中地表明郑观应对官督商办看法的，就是众所熟知的《商务叹》一诗。上文已经提到，《商务叹》有两个不同的稿子。为了供大家研究，不妨录出甲辰稿本《商务叹》的主要部分四十句于下：

① 《盛世危言·商务二》，《郑观应集》上册，第612—613页。

② 《盛世危言·商务二》，《郑观应集》上册，第613页。

③ 《致陈君翊周书》，《后编》卷十，第115页。

④ 《盛世危言·商务二》，《郑观应集》上册，第611页。

⑤ 《复上海招商局股东庄君得之拟集股东会议注册准归商办书》，《后编》卷十，第70页。

⑥ 郑观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资料。

中华物产冠五州，	自然之利天所与。
取而不竭用不穷，	矿路宏开国自裕。
可惜民间习气深，	开矿每为风水阻。
风水岂能阻外人，	徒为外人守其土！
试看山西福公司，	承办全省无今古。
土人领照纳千金， ^①	贸然举办无次序。
漠河虽然获利多，	现此亏本报效巨。
开平煤矿产业宏， ^②	后任徇私招强虏。
轮电开平局变更，	官夺商权难自主。
总办商董尽属官，	不依商律由商举。
律载大事应会议，	三占从二无私许。
未开会议集众商，	未见股东岁一叙。
商董谁是查账人？	股息多少任他与。
轮电两局产业多，	几经外寇不敢取。
开平果能效所为，	矿局何必入洋股！
大权今已属他人，	徒劳昔日经营苦。
商律虽有亦如无，	公司专制如天府。
用非所学竟如斯，	那得不受外人侮？
公司因此不及人，	为丛驱爵弗胜数。
若再因循不整顿，	中华安得大商贾！

这些诗句从矿业不振，逐步被外国人侵占谈起，接着指出“轮、电、开平局变更，官夺商权难自主”，重点就开平“后任徇私招强虏”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开平被后任督办张翼（字燕谋）盗卖的过程，是于1900年6月开始的，12月12日所谓开平矿务有限公司在伦敦注册，1901年2月19日双方签署移交约及副约，6月4日订立试办章程，从此开平矿务局变为一家英国公司，一切权力被伦敦董事部所操纵，张翼为首的中国董事部成了一个装饰品。张翼拖延至1901年7月上奏，根本没有把事实真相禀明，使清廷蒙在鼓里，只知道开平改为中外合办企业。1902年11月16日公司的洋总办威英为要在无水庄新购矿地下钻，一时受到阻挠，便悍然命令洋矿师撤悬中国龙旗。署滦州知州叶溶光带兵数名巡至唐山，提出此矿现与英国合办，理应华、英两国旗并悬，次

① 原注：广东省领照开矿，纳饷千两。

② 原注：唐君景星创办开平煤矿，惨淡经营。禀请北洋大臣委余总办开平粤局，代购广州南关码头、棧地六十二亩及升科河滩百亩，共实银一万五千余两，现估值一百数十万。奈总局十年不纳稅，照例充公。

日清晨仍将龙旗挂上^①。11月20日英国公使萨道义据驻津总领事的报告,致函清政府外务部,竟称“唐山英国开平矿务公司忽被华兵占踞,悬挂华旗”,表示抗议^②。1903年3月,直隶总督袁世凯奏参张翼。这样,案情彻底暴露,举国震惊。当时郑观应在广东听到这个消息,结合轮、电两局被袁世凯督办,自己被排挤出招商局,对商务衰败不免触情兴感,写下了《商务叹》,结束两句为“屈指商战四十年,感慨时艰告君父!”(甲辰稿本)1904年冬郑观应修订其《诗草》时,对这首诗作了反复改动。

我们把上录甲辰稿本《商务叹》四十句同通行的己酉本《商务叹》相应部分作对勘,可以发现上录甲辰稿本的第二段二十四句(“轮、电、开平局变更”至“中华安得大商贾”)增加为己酉本的三十二句(“轮船、电报、开平矿”至“为丛驱爵成怨府”),而内容也有所不同。己酉本《商务叹》的相应部分着重谈招商局,归结时写出“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这样触目惊心的警句。

郑观应就开平、电报、招商三局的重大变更,怎样具体抨击官督商办制度的呢?我们试作以下的论析。

开平矿务局在总办唐廷枢的主持下,成效显著,欣欣向荣。1892年8、9月间,任开平粤局总办的郑观应被召赴天津、开平。这时唐廷枢病重,要留他帮办开平矿局。郑当即婉辞,“力劝稟请张观察燕谋理其内,陈观察蕙廷理其外,内外得人,局务必有起色”^③。可见郑观应当时认为张翼负责矿局内部事务还是能够胜任的。这年10月唐去世后,由张翼继任。到1909年后,郑观应才揭了张翼的老底:“张系醇邸之随员,故北洋大臣不问其材具如何,遽升为督办。张恃有护符,营私舞弊,不一而足。”^④这样的人怎么能办好开平这样庞大的新式矿业呢!郑观应在《商务叹》及与友人信中指出张翼在开平局的两大问题。一是“徇私招强虏”(甲辰稿本),“擅自合洋贾”。原注云:“开平借庚子之乱,不集董事会议,竟擅自与西人定约,入股合办。”(己酉本)当然,开平不是中外合办的问题,而是史无前例的外国鲸吞中国企业的大案。在英帝国主义方面,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大阴谋,在张翼方面则是一次对民族的大贩卖。郑观应认为造成这次事件的原因,首先是由于督办的擅权徇私,“公司专制如天府”(甲辰稿本);其次,由于督办的“用非所学”(甲辰稿本)。1900年6月,帝国主义联军铁蹄侵入大沽、天津地区,占据了开平局在那一带的码头厂栈,张翼妄想依靠洋员办理以至与外商合股的办法来保全企业,便逐步堕入帝国主义者设下的圈套。他自己

① 《外务部收总办开平矿务兼办唐山保甲煤税事宜候补道杨喜庆、滦州知州叶溶光禀》,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五日,《矿务档》第1册,第194页。

② 《外务部收英使萨道义信》,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一日,《矿务档》第1册,第192页。

③ 《盛世危言·开矿》五卷本,附录开平矿事略,《郑观应集》上册,第707页。

④ 《复陈君可良、唐君翹卿、谭君幹臣论商务书》,《后编》卷八,第43页。

捞到了一定的好处（分得酬劳股25,000镑和徒拥空名的“永久督办”称号，享受高额年薪若干），就把股商和民族权益完全置诸脑后，甚至连自己的名誉都不顾了。从应付战局来说，招商局早有成功的经验。郑观应写道：“甲午、庚子之变，轮船局产皆余经手换旗，安然往来海上。事后赎回，祇给领事注册费。”（己酉本《商务叹》注）正是：“开平果能效所为，矿局何必入洋股！”（甲辰稿本）二是使开平粤局城南地基公司的股商蒙受很大损失。^① 1891年唐廷枢、郑观应经手组织这个公司，由开平以及唐、郑和李玉衡共出资广平银27,200两（开平局1万两，唐廷枢7,200两，郑、李各5,000两），购得广州城南沿河土地一段67亩以及升科滩地百亩余，讲明归开平局经理。以后，张翼对股商的合理要求，不是“悍然不恤”，就是“一味迁延”，“复敢违背公司章程，不会商股东，擅将唐、李、郑合股之地俱归并开平矿局，与英商合办”^②。由于长期不纳税，土地照例充公，经过交涉，才发还18亩。自1906年兴筑长堤以后，地价大涨，郑观应占股1/6，损失银30余万两。这是他个人经济损失最大的一次。“各股友损失亦复不少。张燕谋之贻误至此，良可浩叹！”^③ 导致开平发生这两大问题的制度上的原因，不能不说是官督商办的弊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郑观应理正词严地抨击官督商办，指控“官夺商权”。

电报局和招商局的变更，是由于袁世凯蓄意把它们控制在自己手里，以便壮大自己的势力。1901年11月7日清廷任命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充北洋大臣。第二年10月盛宣怀丁父忧，照例奏请开缺，这就给袁世凯以可乘之机。11月末，袁世凯回籍葬母返津、道经上海时，对盛宣怀“力劝解去利柄，到京即有收回电线、整顿招商之举”^④。

1902年12月12日清廷上谕宣布电务收归官办，接着于1903年1月15日派袁世凯为督办电政大臣，吴重熹（直隶布政使，开缺）以侍郎候补派为驻沪会办大臣，并规定“该局改归官办之后，其原有商股不愿领回者，均准照旧合股”^⑤。该年3月29日吴重熹正式接办电报局。郑观应的态度是反对的。上谕有电报“中国创自商办，诸多窒碍，亟当收回，以昭郑重”等语，根本“不念创办之劳”，何况外国“凡公司创办

① 己酉本《商务叹》对此事有句云：“地稅不納被充公，利失百萬真乳腐。”原注：“代購廣州地百數十畝，因久不納稅，聞被充公。”系就開平損失巨利的角度下筆的。但這時開平已被英帝國主義吞并。鄭觀應在《後編》中的有關敘述，則都著眼於股商的蒙受損失，此不俱錄。

② 《廣州城南地基公司股東說帖》，《後編》卷十一，第27頁。

③ 《答李偉堂君書》，《後編》卷十五，第40頁。

④ 盛宣懷：《寄長沙俞中丞電》，光緒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七日，《愚齋存稿》卷五十九，第19頁。

⑤ 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中華書局版，第5冊，總第4980頁。

者，均有红股酬劳”。并且电局最初官办时月月亏损，以后归商经营，历届获利已有五六百万两。“今办有成效，又归官办，无异农田甲就荒，招工愚，乙有获，甲夺回，则不论贤愚皆知曲直矣。”^①郑观应对此当然表示反对。

1908年6月，邮传部奏准将电局商股归官收赎。在根据什么标准、确定每股(票面为100元)赎价多少的问题上，官商双方争执不下，发生了一次“电股风潮”^②。“收赎电股，商界甚诤。实因华商股分惟此为最，中小户执为恒产，比大户尤着急。”^③邮传部奏请“依照市面票价，酌中给值，于每股股本外特予加价”^④，初定每股给价170元，以后又“加价十元，作为优待”^⑤，即180元。郑观应正式提出两点：首先，从原则上反对收赎，“外侮日亟，各股东谓时势不宜”；其次，即使要收赎，“例应札飭商董，公举工程司估计共值银若干两不受亏，方昭公允”^⑥，这是他一贯的主张。郑观应所持公估办法同邮传部所定赎价，两者差距是很大的。根据已刊布的二十五届(1907年)帐略，除官利、余利、各项报效之费外，实存资产银370余万两，计合洋528万余元，按股份220万元科派，每股应分240元(一部分股商坚持这种赎价办法)。如果进行公估，资产总值肯定超过帐面数额，则每股价值当在240元以上。即使退一步以每股240元计，那末，邮传部所定赎价每股少给60元，电局股商(全部股分22,000股)损失达132万元之多。邮传部不仅从根本上否定公估，而且还对股票市场价格打个折扣。有股商要求根据上年以及近期的股票市价每股200元作为赎价，盛宣怀认为这是一种“和平之论”^⑦，也未被邮传部采纳。所以，邮传部定的股价并不是该部奏折所鼓吹的“持平办理”，更非“体恤商艰”之意。^⑧盛宣怀也感到“诚难免抑勒苛刻之谓，于将来商务大受影响”^⑨。《商务叹》中“电报贬价归国有，不容商董请公估”(己酉本)两句，就是揭露邮传部“剥商”实情的概括。还有一件使郑观应很为恼火的事。他本是电报局的创办董事，当初股东公定每月给他薪俸100元。1902年末宣布收归官办后，直至1908年，六年未发，共计7,200元。既然收赎商股，他便向邮传部尚书陈璧问及此事。陈复电称，早由前任一律停发。但郑观应查询获悉，董事薪俸仍有支給，惟并非创办人。他才恍

① 以上引文见《致伍秩庸星使论创办中国电报原委书》，《后编》卷十二，第20—21页。

② 《寄农工商部杨侍郎电》，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初一日，《愚斋存稿》卷七十四，第1页。

③ 《寄张中堂》，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初一日，《愚斋存稿》卷七十四，第1页。

④ 《交通史电政编》第1册，第51页。

⑤ 盛宣怀：《致邮传部公函》，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二十日，《盛宣怀未刊信稿》，第122页。

⑥ 《致邮传部右侍郎盛杏荪官保书》，《后编》卷十二，第21页。

⑦ 《致周郁山》，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十九日，《盛宣怀未刊信稿》，第114页。

⑧ 《交通史电政编》第1册，第51页。

⑨ 《致翰林院侍讲吴》，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初六日，《盛宣怀未刊信稿》，第118页。

然大悟，原来“是将创办人之薪俸调剂其私员耳”。于是深有感触地说：“窃思专制之严，功臣如猎狗，不为人所烹，已属幸甚，何敢再辩！”^①这句话又一次揭示了中国封建专制的严酷，也是对官收电局、贬价购买的全过程所发出的控词。

轮船招商局又发生了什么重大变更呢？袁世凯先于1902年3月间奏委丁忧通水道沈能虎进招商局“会同各员董妥筹维持，并司稽察”，接着增派直隶候补道徐傑入局。1902年12月4日袁世凯由沪返抵天津后，即向清廷上奏，附片陈报在沪时面饬招商局各员董等“一切要务随时禀承臣核示遵办”^②，获得清廷认可后，于1903年春委派直隶候补道杨士琦随同吴重熹到上海接办轮、电两局，旋又奏派杨总理轮船招商事宜并参赞电政。自从袁世凯控制招商局以后所发生的一切，正是郑观应初进招商局前所顾虑的一切，“今不幸而言中矣”^③。

首先是郑观应被袁世凯派来的人排挤出局。1902年夏，“谊兼师与友”^④的广西巡抚王之春奏调郑观应赴桂差委。“时值袁官保署理北洋大臣，所有轮船、电报均归袁官保督办，因未知官应入局原委，对于局务几经惨淡经营，竟为直隶某候补道排挤”^⑤。虽经盛宣怀咨请王之春准予免调，并咨袁世凯查照，招商局各股东电请津海关道唐绍仪代禀袁世凯挽留，但郑观应考虑，“语云：‘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亦何必为老骥之恋栈。然士为知己者用，无论留否，决于岁杪赴桂。”^⑥

郑观应指出袁世凯及其后任杨士骧对待招商局同当年李鸿章很不一样，且有将招商局改为官办的意图。“查招商局官督商办基于北洋奏案，历观李文忠公原奏，所谓官督者，不过提倡维持之意。所派各员，或本属创办，或曾报巨资，概系休戚相关，绝无丝毫凭藉，至办事商董，历来皆由商举。自光绪二十九年，官权益重……当时本即蓄有易商办为官办之意。祇因完全商股，惮于发端。”^⑦实际上，袁世凯和杨士骧已把招商局“据为官局，任所欲为”^⑧。举其大者，约有三点：（一）调剂私人，诸多糜费。杨士骧“以招商局为北洋外府，调剂私人。查商办公司通例，定一总理一协理。昔年招商局祇有会办二人。今北洋大臣札委坐办、会办、副办共计八人，另挂名司事。”^⑨“坐办、会办除月给薪水银三百两、马车酬应等费外，岁加津贴银五千

① 《复香港电报局总办温佐才观察》，《后编》卷十二，第26页。

② 以上引文见袁世凯，《仿认真理招商局由片》，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九日，台北影印《袁世凯奏折专辑》第3册，第741页。

③ 《致商务大臣盛宣怀论轮电两局书》，《后编》卷十，第66页。

④ 《祝王爵棠方伯六十寿》，《诗草》己酉本卷一，第20页。

⑤ 《上戴少怀尚书书》，《后编》卷四，第32—33页。

⑥ 《致督办招商局盛杏荪官保书》，《后编》卷十，第67页。

⑦ 《轮船招商局董事会致交通部呈文》，《后编》卷十，第98页。按：交通部当为邮传部之误。

⑧⑨ 《致盛杏荪官保书》，《后编》卷十，第68页。

两。昔年论余利而分花红，今则改花红为津贴。”^①（二）用非所学，营私舞弊。“北洋大臣所委各会办，多是直隶候补道，用非所学，各怀私意，事权不一。”^②袁世凯委任会办的锺文耀“尸位素餐，无弊不作。最可诧者，少川（唐绍仪——引者）调出洋时，即于数日内购买东洋煤八九万吨之多，价极贵而煤极劣，本局会办绝不知晓。只因临去欲得大批佣钱，遂置局中利害于不问。”^③（三）照旧报效，消耗老本。“北洋接管以来，揽戴日坏，取利日减，洋船之势力日炽。”^④1908年第35届年结，“只得余利银二万三百两，仍于自保船险项下拨出银三十万两，报效北洋兵轮经费六万两，实业学堂二万两，兼支股息一分。”^⑤这样，虽有些微盈利，却等于亏本30万两。“查其清帐，确是大好局面已变为亏本公司矣。”^⑥这时期招商局弊病丛生。北洋大臣持什么态度呢？“以为有巨款报效，各总办均惟命是听，亦不查问。”实际上，弊病大多是他一手造成的，当然置若罔闻。各股东呢？则“畏官如虎，敢怨不敢言”^⑦。

1909年春，邮传部有将招商局收归官办之意。盛宣怀设法抵制，策划组织董事会，公议章程，禀部注册，使招商局成为完全商办公司^⑧。年近古稀的郑观应不顾衰老之身，南北奔波，积极参预。可是，这年5月上谕招商局归邮传部管辖，8月正式接管。邮传部“谓本局与别公司有别，未准照商律注册。各董事复公举官应入京，与交通部（当为邮传部——引者）、农工商部尚书、侍郎辩论再三。官应惟以股东命意，公司乃完全商股，如政府不准保护，股东为血本起见，或迫于出售，或托庇外人，董事无法抗阻，始准注册，并给执照返沪。”^⑨11月20日农工商部发给执照。那末，问题是否得到解决了呢？没有。招商局董事会拟订一份《隶部章程》。总则第一节规定：“本局系完全商股，恪遵商律，悉照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但邮传部批，此节应改为：“本局虽非完全商办，实系完全商股，除恪遵归部管辖之谕旨，并援照北洋成案，所有本局用人、办事由部监督并派员办理外，其余悉遵商律。”邮传部仍死死地对招商局实行“官督”。郑观应有力地反驳道：“今部谕所有本局用人、办事由部监督并派员办理，不需下问，惟设董事会以助官力之不足，外人笑本局是商督官办，非官督商办也。”^⑩股商始终拗不过封建专制的官府。“虽经注册，然用人之权

① 《致广州香港澳门招商局股东挂号处诸公书》，《后编》卷十，第71页。

② 《致商务大臣盛宣怀论电两局书》，《后编》卷十，第67页。

③④ 《致吴蔚若函》，宣统元年四月初十日，《盛宣怀未刊信稿》，第169页。

⑤ 《复上海招商局股东庄君得之拟集股东会议注册准归商办书》，《后编》卷十，第70页。

⑥ 《致吴蔚若函》，宣统元年闰二月初五日，《盛宣怀未刊信稿》，第158页。

⑦ 以上引文见《致广州香港澳门招商局股东挂号处诸公书》，《后编》卷十，第72页。

⑧ 《致郑陶斋函》，宣统元年闰二月初六日，《盛宣怀未刊信稿》，第160页。

⑨ 《辛酉年春致轮船招商局董事会书》，《后编》卷十，第128—129页。

⑩ 以上引文见《商办轮船招商公局股东签注部批隶部章程》，第8—9页。

邮部仍肆行干预，凡董事议决应行之事，而办事人恃部委之员，有恃无恐，阳奉而阴违，以致积弊难除。”^①郑观应在《商务叹》中所述招商局的变更情况是：“轮船局权在直督，商欲注册官不许。总办、商董举自官，不依商律由商举。”“调剂私人会办多，职司名目不胜数。不洽輿情无是非，事事输人糜费巨。用非所学弊端多，那得不受外人侮。”（己酉本）。

清政府当局在这几年间接二连三地表示要保商，似乎煞有介事。袁世凯1902年12月的飭认真经理招商局的附片，假惺惺地奏称“务期保全商本”。1903年10月商部奏请力行保商之政^②。1904年7月清廷上谕，着各将军督抚于应兴各业，极力振兴，“敢有怠玩因循，保护不力，定行严处，不稍宽贷”^③。但是，电报局和招商局的现实，不是清楚地告诉人们：“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吗？

“呜呼！以办有成效之三大公司，犹以官督商办之故，不能与泰西各公司竞争于世界之舞台，此中国商业所以日居退败也。”^④面对开平、电报、招商三大企业在1900年以后发生这样重大的变更，郑观应感到几十年的商战失败了，但仍寄希望于后继有人，进行整顿。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他写了这首《商务叹》。“直记时事，不避嫌怨……但救国苦心，妇孺皆知，一览即印入脑际。或于数十年后，无人不忆及当时事势”^⑤。郑观应所写大部分《诗草》的目的是如此，写《商务叹》的目的也是如此。

《商务叹》抨击的具体对象，系指袁世凯及其亲信杨士骧、邮传部（前任尚书陈璧和继任尚书徐世昌）以及张翼等人。郑观应并没有停留于就事论事，而是提高到对官督商办制度的批判，还进一步提出了对封建专制政体的指控。他深刻地认定：“公司之腐败，多由于政治不良，上行下效”^⑥。可是，时代已经进入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他仍把改良政治的内容限于“速立宪法”、“商人得参与政权”^⑦，不自觉地站到了历史进步潮流的对立面。关于这点，我们也是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综上所述，在1900年以前，郑观应本人始终为官督商办企业尽心效力，仅对官督商办制度的弊病作了一定程度的批评；而1900年以后，开平、电报、招商三局相继发生一系列重大变更，郑观应才写出了“官夺商权难自主”（甲辰稿本《商务叹》）和“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己酉本《商务叹》）这样极度愤慨的诗句。弄清楚《商务叹》的主旨，对正确评价和研究郑观应关于官督商办制度的认识，当有裨益。如果离开当时历史条件的具体分析，而作一般的论断，那是不能说明问题的。

①④ 《复陈君可良、唐君翘卿、谭君幹臣论商务书》，《后编》卷八，第44页。

② 《光绪政要》卷二十九，第33—34页。

③ 《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五七五，第18页，光绪三十三年六月癸未。

⑤ 《罗浮倚鹤山人诗草》自序，己酉本卷一，第9页。

⑥ 《丁巳年请当道与总商会协力维持商办粤路条约》，《后编》卷九，第85页。

⑦ 《后编》自序，宣统元年中秋。